

欧文·戈夫曼：

微观社会学的探索

WEI GUAN SHE HUI XUE
DE TAN SUO

王晴锋◎著



Erving Goffman

欧文·戈夫曼：

微观社会学的探索

WEI GUAN SHE HUI XUE
DE TAN SUO

王晴锋◎著



Erving Goffman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文·戈夫曼：微观社会学的探索 / 王晴锋著.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8. 12

ISBN 978-7-5660-1574-7

I. ①欧… II. ①王… III. ①微观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67721 号

欧文·戈夫曼：微观社会学的探索

作 者 王晴锋

责任编辑 李苏幸

封面设计 汤建军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 话：68472815 (发行部) 传真：68932751 (发行部)

68932218 (总编室) 68932447 (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5.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60-1574-7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互动的形式化分析	(20)
一、基本概念	(21)
二、分析单元	(25)
三、互动原则	(30)
四、组织要素	(38)
第二章 互动系统：运行与结构	(42)
一、互动系统的运行	(42)
二、互动系统的结构	(54)
第三章 策略性互动与仪式性互动	(60)
一、策略性互动	(60)
二、面子工夫与互动仪式	(68)
三、规避仪式与呈现仪式	(73)
四、支持性交换	(77)
五、补救性交换	(83)
第四章 全控机构	(93)
一、全控机构的结构与功能	(93)

二、自我的道德历程	(99)
三、隐秘生活与次级调适	(107)
四、医疗模式与住院治疗	(115)
第五章 框架分析	(119)
一、框架、调音与编造	(121)
二、框架外活动与行为锚定	(131)
三、框架破裂与经验之脆弱	(142)
四、谈话的框架分析	(148)
第六章 谈话形式	(158)
一、指称与回应	(159)
二、自我谈话与回应性叫喊	(165)
三、谈话分析图式	(171)
四、仪式性谈话	(178)
第七章 自我、污名与女性.....	(182)
一、自我的两重性	(182)
二、污名与越轨	(194)
三、性别广告	(210)
结语 戈夫曼的社会学遗产.....	(228)

绪 论

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 (Erving Goffman, 1922—1982) 是最为知名的西方社会学家之一, 他的著作被广为传阅。作为微观社会学时代的领军人物, 戈夫曼以拟剧论独步学林, 并将“面对面互动”开辟为自成一体的研究领域。戈夫曼关于自我、污名、全控机构以及框架分析的研究引起学术界持久的关注, 并对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以及语言学等学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著作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引用率, 例如, 在 1969—1977 年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中, 戈夫曼被引用的频次高达 3473 次, 仅次于塔尔科特·帕森斯 (Talcott Parsons)。^① 他最频繁被引用的著作是《收容所: 论精神病人与其他被收容者的社会情境》(*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1961) 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① Mark Oromaner, “Erving Goffman an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10, No. 3, 1980, p. 289.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1959)。到了1981年,《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的销量已经超过50万册,而《污名》(*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 1963)已经重印13次,并被译成十余种语言。戈夫曼已然成为现代社会科学智识地图上的“地标性”人物。然而,与这种智识景观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虽然人们广泛援引戈夫曼的观点,却相对缺乏对他的整体著述进行详细而系统的探讨。^①如同许多思想家一样,戈夫曼也面临着这样的窘境:他被世人广为谈论,而真正潜心阅读他著作的人却不多。而且,很多人对戈夫曼存在误解,尤其是将他的社会学等同于拟剧论。在西方学术界,曾有“戈夫曼之谜”的说法,而这个谜底是戈夫曼逝世不久前自我揭晓的,他将毕生的学术使命概括为致力于“互动秩序”的研究。^②本书旨在较为系统地介绍戈夫曼社会学的思想体系。在绪论部分,主要对他的著作的内容、写作背景、资料来源以及他关于微观互动系统的研究方法做一些必要的交代。

戈夫曼的研究深受芝加哥社会学派的影响。虽然在戈夫曼攻读博士学位时期,芝加哥社会学派已经失去了昔日在美国社会学界的支配性地位,但是戈夫曼的研究方法、学术旨趣以及理论假设等都可以追溯至他的导师埃弗雷特·休斯(Everett C. Hughes)与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诸位先辈们,诸如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罗伯特·帕克(Robert E. Park)、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约翰·杜威(John Dewey)以及欧洲古典社会学的奠基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埃米尔·迪尔凯姆(Émile Durkheim)和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等。^③戈夫曼早年的学术训练很好地结合了人类学与社会学,他在芝加哥大学时期的另一位导师劳埃德·沃纳(Lloyd Warner)是社会人类学家,曾对澳大利亚

① Philip Manning, *Erving Goffman and Modern Sociology*, Cambridge: Polity, 1992, p. 6.

② Erving Goffman, "The Interaction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8, No. 1, 1983, pp. 1-17.

③ Louis Menand, "Some Frames For Goffman,"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 72, No. 4, 2009, p. 296.

的原住民进行过民族志研究，而埃弗雷特·休斯主要研究职业社会学。因此，对戈夫曼而言，人类学与社会学之间不是截然二分的。戈夫曼关于互动行为的研究也受当时其他学者对动物行为和语言研究的启发，并得到“小群体”互动研究和精神疗法等各种资源的支持。^①作为经验型的社会学家，戈夫曼强调田野工作的重要性。在他的学术生涯里，田野点不断地发生变换：从设特兰群岛的孤岛社区、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和拉斯维加斯赌场等具有可见边界和社区性质的场所到更为一般性的城市街道等公共空间，这些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场域。

1951年，戈夫曼在《英国社会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阶级地位的象征》(“Symbols of Class Status”)。^②1956年和1959年，戈夫曼先后在英国和美国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61年该书获得美国社会学协会颁发的“麦基弗奖”(MacIver Award)。《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系统探讨了拟剧论的基本原则和构成要素，包括表演、剧班、区域与区域行为、非协调性角色、角色外沟通以及印象管理等，并详细阐述了人际沟通的微妙行为艺术，诸如“神秘化”“缺席对待”“剧班共谋”等。日常生活的表演者试图欺骗、隐瞒他人以塑造期望的理想形象，同时又谨小慎微、如履薄冰，时刻担心被他人暴露和揭穿。拟剧论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分析视角，它也是戈夫曼用于建构更大思想体系的“脚手架”，自我呈现和印象管理是拟剧论的主要分析内容。戈夫曼反对传统的自我观和身份类别，自我、身份与社会秩序都具有偶然性特征。他将个体分为两个基本的部分，即表演者和角色。展演性自我是通过互动实现的合作性产物，它是权宜性的，并非稳定的和一成不变的。戈夫曼的自我观具有两重性，即生物性与社会性、情境性与能动性，其中情境化自我与作为能动者的自我不是截然分离的。从整体而言，戈夫曼没有摒弃自我的心理-生物学解释，但他更强调自我

^① Erving Goffman,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New York: Pantheon, 1967, p. 1.

^② Erving Goffman, "Symbols of Class Statu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2, No. 4, 1951, pp. 294-304.

的社会性和情境性。这种双重自我观可以调和在阐释自我时场景与能动性、结构与行动之间的张力。^① 戈夫曼还以拟剧论为基础对污名现象进行互动分析，他尤为关注污名管理的技术与策略，试图将不同污名的情境结构置于统一的框架，并以关系性的语言加以描述。在戈夫曼看来，每个人的身份都可能遭遇污名，进而威胁自我的呈现。通过聚焦于遭贬抑的社会身份，戈夫曼探讨了污名化进程，认为污名是社会建构的身份过程。正常人与污名者不是根本不同的类别，而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视角，它涉及普遍存在的双重角色之社会过程。污名并非绝对的本质观念，正是社会与文化赋予遭贬抑的属性。正常人与污名者之间构成一个连续统，污名者是正常的越轨者，戈夫曼由此质疑越轨社会学的内在合法性。

1954年秋至1957年底，戈夫曼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的社会环境研究实验室担任访问研究员。在这三年期间，他对临床中心病房里的个体行为进行了参与式观察。1955年至1956年，通过首席助理医师杰伊·霍夫曼（Jay Hoffman）的协调，戈夫曼得到许可，在华盛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进行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其直接目的是研究住院病人的社会世界。在戈夫曼调查期间，作为联邦机构的圣伊丽莎白医院收容了7000多名住院病人，占哥伦比亚特区所有病人的四分之三。医院的高层管理者都知晓戈夫曼的研究意图，在他们的积极配合下，戈夫曼成为医院体育部的主任助理，而他的公开身份则是“一位关于休闲娱乐与社区生活的研究者”。在白天，戈夫曼与病人一起消磨时光，尽量避免与医护人员之间的社交性接触。他还随身携带着病房的钥匙，可以随意出入任何一间病房，或

^① 正是由于戈夫曼的这种自我观，国外有学者指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的书名存在问题，因为“自我呈现”（*presentation of self*）似乎意味着行动者在进入社会之前已经存在一个自我，但戈夫曼的观点其实是认为自我在情境互动过程中形成，因此，确切的表述应该是“自我表演”（*performance of self*），而不是“自我呈现”。可参见：彼得·兰特、奈杰尔·沃伯顿：《论戈夫曼》，席志武译，《美育学刊》2018年第2期。事实上，国内最早的中译本确实译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徐江敏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而1989年浙江人民出版社（黄爱华、冯钢译）的译本和20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冯钢译）的译本均名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者在医院内巡视观察病人的日常生活。总之，圣伊丽莎白医院给予戈夫曼特许权，使他享有充分的自主性，医院的任何一扇门对戈夫曼都是敞开着，他不必受医院其他事务的干扰，没有人去干涉他的研究，而且他也无须向医院的任何人汇报观察结果。除了在出版前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之外，医院没有对他的研究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审查或删减。不仅如此，医院还为戈夫曼支付薪水、提供文秘协助和同行评议，鼓励他以社会学（而不是精神病学）的视角研究医院，这在当时美国的某些大学仍然对自由调查设置传统壁垒的背景下尤为难得。戈夫曼也很感激这种为纯粹的科研活动提供的自由和机会，以及一些政府机构的精神病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对此持有的开放、包容和不偏不倚的态度。

根据对圣伊丽莎白医院进行的田野研究，戈夫曼出版了《收容所》，该书其实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科学理论整合中心”完成的。《收容所》分为四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其中“论全控机构的特征”是从普遍意义上探讨全控机构的社会生活，主要通过精神病院和监狱这两个机构，其重要特征是成员都是非自愿性的；“精神病人的道德历程”论述了被收容之后的制度化对个体原有的社会关系造成的影响；“公共机构的隐秘生活”探讨全控机构期望被收容者对围墙内的生活表示归附和顺从，但被收容者会在他们自身与这些期待之间保持距离；“医疗模式与精神病人的住院治疗”讨论精神病院的专业职员以及医学视角在向精神病人解释其所处的情境时具有的作用。除了专著《收容所》之外，戈夫曼关于精神病院的观察资料还用于其他一些研究，尤其是探讨互动仪式的重要论文《论恭敬与风度的本质》。^①在阐述普遍意义上的互动系统时，戈夫曼也经常以精神病医生、精神病人与护士共同在场的互动作为实例。《公共场所的行为：论聚集的社会组织》（*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Notes on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Gatherings*, 1963）一书的很多材料也来自戈夫曼在精神病院的参与观察，而

^① Erving Goffman, "The Nature of Deference and Demeano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ol. 58, No. 3, 1956, pp. 473-502.

且它是以精神病学家的研究入题的。在该书中，戈夫曼试图提出一种关于交往形式与结构的分析框架。正是通过对精神病人进行观察和分析，戈夫曼认为个体的自我依赖于人际互动中恰当地运用社交礼仪，自我只能通过确证性的制度设置方得以持存，而精神病院没有对自我的构成性要素提供充分而稳定的支持。在全控机构里，自我的神圣属性与个人的领地遭到严重破坏和侵犯，自我遭受系统性的贬抑、削弱和凌辱。

6 算计、博弈是面对面互动的重要特征。戈夫曼的《策略性互动》（*Strategic Interaction*, 1969）一书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冲突的策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1960）。尽管后来谢林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认为自己研究的是个体或集体行为，而且也探讨个体行为、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① 谢林试图用博弈论解释广泛存在的冲突现象和社会问题，包括从国际关系领域的核威慑到家庭共同体中的人际纷争。在他看来，掌控战争与管理交通堵塞、阻慑俄国人和吓唬孩子等现象之间存在诸多相通之处。在《冲突的策略》中，谢林区分了三种主要的博弈类型，即零和博弈、合作博弈和混合动机博弈，后者是前两者的调和型。

谢林与戈夫曼之间是相互影响的。1966—1967年，戈夫曼在哈佛大学进修时曾与谢林合作，他关于策略性互动的思想无疑受谢林的博弈论影响，但在这之前，戈夫曼就已经关注互动的策略性。例如，在1963年前后，他曾经参加过关于策略性互动和冲突的会议。谢林也大方地承认自己多年来一直被戈夫曼的著作吸引，并高度赞赏戈夫曼的《互动仪式：关于面对面行为的论文集》（*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1967）。在《冲突的策略》里，谢林一方面将战略威慑理论系统化，同时也参考了戈夫曼关于“面子工夫”的研

^① 托马斯·谢林：《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谢静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

究,^①以阐明即使是高度礼节性场合的正式行为也蕴含着丰富的博弈论内容,从而强调道德与自律的重要性。谢林认为,尽管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寻求各种增益策略,但它们并非零和博弈,而是混合动机博弈。在此类博弈类型中,沟通居于核心的位置,行动者之间是相互开放的。谢林亦探讨博弈过程中的信任问题,认为信任在零和博弈中是一种自杀性策略,在合作博弈中是前提条件,而在混合动机博弈中,信任扮演着复杂而微妙的角色。信任是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得以可能并持续进行的必要条件,人人自利将导致零和博弈或囚徒困境。在《策略性互动》里,戈夫曼以博弈的视角和“非沟通性术语”分析场景和面对面互动,他论述的博弈类型主要是谢林所说的混合动机博弈。在探讨人际互动和印象管理艺术时,戈夫曼强调道德与仪式维度,认为面对面互动与个人的仪式属性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领地类型是紧密契合的。戈夫曼和谢林用于分析互动行为的术语也很相似,它们包括互动决策、承诺、行动变化的步骤以及“聚焦点”等。^②然而,戈夫曼与谢林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尤其是戈夫曼从一开始就质疑“沟通”这一术语。在他看来,关于面对面互动的研究涉及参与者迅速变化的行为展演,搜集个体遵从行为之证据的主要方法是观察行动者与他人共同在场时的各种表现,但这并不是研究狭义上的“沟通”。戈夫曼试图脱离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并阐明在分析人际交往时博弈论与其他视角之间的关系。

在《公共场所的关系:公共秩序之微观研究》(*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1971)一书的扉页,戈夫曼引用了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社会学原理》中的一段话。斯宾塞认为,公共场所对各种公共行为的最早、最具普遍性同时也是不断自发开始的管理形式正是对礼仪进行的管理,而这也正是《公共场所的关系》的主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公共场所的关系》延续了《交

^① Erving Goffman, "On Face-Work: An Analysis of Ritual Elements in Social Interaction," *Psychiatry*, Vol. 18, No. 3, 1955, pp. 213-231.

^② 卢周来:《一位“走上歧路”的经济学家——纪念托马斯·谢林》,《读书》2017年第4期。

遇：关于互动社会学的两项研究》（*Encounters: Two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Interaction*, 1961）^①、《公共场所的行为》（1963）和《互动仪式》（1967）等著作关于面对面互动及其秩序的主题。

《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1974）由戈夫曼耗十年之功写成，它主要探讨个人的经验组织，而非社会组织。在该书正式出版之前的十年间，戈夫曼除了开设“框架分析”的课程之外，他还在田纳西州、曼彻斯特和爱丁堡等地的大学以讲座的形式讲授相关内容。^② 框架分析的内容包括编造、调音、框架破裂、错误的框架化以及框架争议等。英国社会学家汤姆·伯恩斯（Tom Burns）认为，戈夫曼对经验如何被组织化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和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utz）等。^③ 在《框架分析》的开篇，戈夫曼简要论述了威廉·托马斯（W. I. Thomas）、威廉·詹姆斯、舒茨、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哈罗德·加芬克尔（Harold Garfinkel）、爱德华·科恩（Edward T. Cone）、巴尼·格拉泽（Barney Glaser）以及安塞姆·斯特劳斯（Anselm Strauss）等人关于多重现实的探讨。在这些学者的思想基础上，戈夫曼认为不同现实之间相互关联形成了一种“选片结构”。^④ 戈夫曼的“框架”概念主要来自格雷戈里·贝特森，而贝特森的框架观建立在“沟通”的基础上。20

① 这里将 encounter 译成“遭遇”。encounter 有“意外”和“偶然性”之意，但译成“遭遇”过于宽泛，既无法表达特定的含义，也无法起到作为学术概念应有的敏感性和区分度。中文语境里的“遭遇”包括“非焦点式聚集”，而戈夫曼的 encounter 主要涉及“焦点式聚集”。类似地，译成“日常接触”（参见《日常接触》，徐江敏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不仅消解了戈夫曼在分析面对面互动时提出新概念的努力，而且取消了 encounter 在戈夫曼的微观社会学中具有的理论潜质。不翻译成“接触”的另一个原因是，戈夫曼经常使用另一个词：contact，明确指出它是更复杂的 social encounter 的一部分，参见 Erving Goffman,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p. 70. 戈夫曼还强调他探讨的是“混合型接触”。

② 例如，1970年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春季学期的“芬顿讲座”（Fenton Lectures）中，戈夫曼曾讲授过框架分析的思想。

③ Tom Burns, *Erving Goffman*,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248.

④ 关于多重现实及其意义阐释问题类似于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双重阐释”，可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田佑中、刘江涛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35页。

世纪 50 年代初，当贝特森研究动物园里的猴子、水獭以及海豚的行为时，集合论和控制论方兴未艾。戈夫曼汲取了关于“元沟通”的思想，但他采用“框架”或“立足点变化”等表述形式，从而进一步细化了阐释图式。戈夫曼亦承认框架分析受戴尔·海姆斯（Dell Hymes）、威廉·拉波夫（William Labov）和乔尔·谢泽尔（Joel Sherzer）等社会语言学家的影响。在戈夫曼那里，“框架”既是一种认知和分析社会的工具，同时也是一种理论隐喻。框架的概念使戈夫曼暂时转移对互动的关注，而探讨人们如何理解特定的行动片段以及如何运用不同的框架行为产生不同的意义。这些理解在本质上是认知性的，它涉及情境定义、框架叠层和框架转化等问题。特定行动片段的参与者可以根据某种初级框架的规则或假定进行感知和理解，这种认知活动亦可能涉及两种基本的转换方式，即调音和编造。

西方学术界经常忽略戈夫曼关于性别关系的研究。《性别广告》（*Gender Advertisements*, 1979）是戈夫曼在性别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该研究具有两个特色：第一，通过琐碎的行为细节展示日常生活中微妙的性别差异；第二，充分运用视觉图像因素。戈夫曼主要从仪式与框架的视角分析性别广告，尤其是从行为学的意义上对性别展现进行仪式化分析。具体而言，戈夫曼从尺码相对大小、温柔的抚触、功能等级、家庭场域、次属地位的仪式化以及被许可的情境撤离等六个维度解码商业广告中的性别呈现。戈夫曼将性别不平等视为框架假定的产物，同时调音、编造、转换和超仪式化等因素使商业广告中的性别展现并非完全是现实的镜像。通过探讨被自然化的性别关系以及性别差异的再生产方式，戈夫曼揭示了父权制的微观运作机制。

谈话分析是戈夫曼一直关注的议题，从他的博士论文《岛屿社区的沟通行为》（*Communication Conduct in an Island Community*, 1953）一直到后来关于补救性交换的阐述，都是以日常生活中自然发生的情境性谈话为基础的。与《性别广告》相类似，《谈话形式》（*Forms of*

Talk, 1981) 也是戈夫曼对框架分析理论的具体运用。^① 《谈话形式》由早先已发表的五篇论文构成，它们大多完成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这些论文围绕着同一个分析主题，而且其文风是“宣言式”的。实际上，《谈话形式》是以会话分析学派（Conversation Analysis, CA）作为批判对象的。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在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和戈夫曼本人关于微观互动研究的影响下，哈维·萨克斯（Harvey Sacks）^② 和伊曼纽尔·谢格洛夫（Emanuel A. Schegloff）、盖尔·杰弗逊（Gail Jefferson）等人创立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会话分析，它的关注点与研究方法均不同于话语分析。在传统的会话分析中，说话者通常指发出声音的个体，他们不断地建构和形塑关于自身的文本，并通过它监控自身的位置，这种分析范式并不对说话者进行任何细化。

戈夫曼严厉批评萨克斯等人提出的理论，尤其是认为“说话者”“听话者”的二元分析模式较为含糊和粗糙。在戈夫曼看来，社会学研究的不是话语陈述本身，而是行动的序列性，也即“个体在情境中基于道德判断采取的话步、立场或结构调适”^③。在分析补救性交换的变体形式时，戈夫曼一再强调他探讨的是个体采取的“立场或位置”，而不是“感受”。^④ 戈夫曼将说话者分解为发声者/发布者（animator）、作者/所有者（author）和责任者（principal），它们共同构成了话语的“生产模式”（production format），这种言语结构的基本要素不同于“参与框架”（participation framework），也即个体具有不同参与地位（被认可或未被认可）的谈话圈，在其中话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被接收。参与框架是话语倾听的结构性前提。生产模式和参与框架中的角色会发生转换，而且两者通常同时发生变化。戈夫曼

^① 尤其是关于唱片骑师（disc jockeys/DJs）的研究，《框架分析》最后一部分是关于谈话的框架分析。

^② 1966 年，萨克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并先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尔湾分校任教（1964—1975）。萨克斯个人及其会话分析学派的命运可谓坎坷，其创始人萨克斯与戈夫曼之间的关系很类似于荣格与弗洛伊德之间的关系。

^③ Erving Goffman,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p. 149.

^④ Erving Goffman,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p. 153.

指出,谈话互动的语境由“仪式化过程”、“参与框架”和“情境嵌入性”三个要素构成。^①作为一种沟通系统,谈话的基本要求是发出者需要知道信息是否被恰当地接收,而言语接收者则须及时表明信息已被正确地理解。戈夫曼强调谈话应被置于语境中加以理解,对此,他以回应性叫喊为例详细进行阐释,认为这些从表面看似乎是无意识的、自行溢出的话语其实具有明确的含义。在戈夫曼看来,谈话系统与其所嵌入的社会世界之间存在松散的联系,“一切言语形式与世界的联系都是松散的,而谈话则更加松散”^②。正是这种松散性为各种形式的话语转换提供了重要基础。简而言之,戈夫曼以“生产模式”取代说话者,以“参与框架”取代听话者,它们为分析谈话立足点的变换提供了结构性基础。

总之,戈夫曼的微观社会学对日常生活中的细微行为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他既关注具体的行动,也没有忽视结构和制度性的要素。戈夫曼认为,研究微观互动材料的其中一个目的是从最细微处着手描述建立在它们基础上的互动的本质单元,另一个目的是揭示在这些单元内部/之间普遍存在的规范性秩序,^③而达成这两个目的的方法是通过“严谨的民族志”辨识行为秩序的“类型和自然序列”。为此,戈夫曼倡导一种“场景社会学”,^④其核心主题是社会组织,被组织化的则是相互混合存在的个人以及由他们产生的短暂的互动行为。这些共同在场的个人及其行为所形成的“社会聚集”(social gathering)是一个处于不断变动过程中的互动实体,它必将是短暂的,易凋零消散,随着参与者的到来而创生,又将随着他们的离去而消亡。戈夫曼尤为关注这种变动中的“规范性稳定结构”。

① Erving Goffman, *Forms of Talk*,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1, pp. 2-3.

② Erving Goffman,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4, p. 502.

③ Erving Goffman,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New York: Pantheon, 1967, pp. 1-2.

④ Erving Goffman,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 New York: Pantheon, 1967, p. 2.

戈夫曼关于面对面互动系统的微观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首先，在戈夫曼之前，面对面互动领域从未被正视为一个独特的议题而充分加以探讨，它被现代社会的研究者视为社会活动中不值一提的“尘埃”，是空洞无物和微不足道的。^① 尽管西方社会学界早已对集体行为有所研究，然而对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交通往来”和社会交遇的结构和模式则鲜有涉猎。互动实践通常被用于阐明其他事物，而它们本身却被认为是无须解释的，或者是根本不值得解释。^② 其次，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社会学尚无法对日常生活中细枝末节的行为资料提供现成的解释框架或进行有效的整理。彼此在场的个体之间进行话语与眼神的交换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然而却很难厘清和解释它们独特的沟通属性，而戈夫曼的研究为分析和整理这些资料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路径。最后，在戈夫曼生活的年代，社会学没有获得如同经济学那样的学科信任、分量与影响力，然而它在严格预测上的失败与系统性理论的空洞无物方面却似乎毫不逊色。^③ 戈夫曼认为社会学忽略了许多重要的变量，各种短视和盲目的乐观限制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他试图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弥补和纠正。总之，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一方面，在自然场景中研究面对面互动尚未具有充分的名义，它还无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登堂入室；另一方面，面对面互动的分析边界不甚清晰。戈夫曼的学术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厘清了面对面互动的边界，并为其正名，即确立微观互动系统研究的合法性与正统性。

戈夫曼认为应仔细考量日常生活的互动细节。在他看来，精神病学家研究无意中使社会学家意识到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公共和半公共场所的行为。该领域“尚未被公认为是社会学研究的特定范畴”，但对它的研究颇为重要，因为“街道、公园、餐馆、剧院、商店、舞池、会客厅以及其他任何共同体聚集场所的行为规则都告诉我

^① Erving Goffman,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p. 64.

^② Erving Goffman, *Relations in Public: Microstudies of the Public Ord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1, p. ix.

^③ Erving Goffman, "The Interaction Order,"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8, No. 1, 1983, p. 2.